

谁的孩子谁抱养 权责清晰兜民生

——权威专家解读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央地财政事权改革新举措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韩洁 胡璐

当小学一年级新生免费领取正版字典和地方课程教科书时,他们跟身后的家长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字典和教科书的经费,可能分别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8日,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一揽子亮出八大类18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改革举措。

多位长期跟踪财税体制改革的权威专家告诉新华社记者,一定程度而言,这份改革方案为部分基本公共服务事项保障制定了“国标”,更为后续分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了引领和支撑。

以“人”为核心 守护百姓获得感

稍微研读这份改革方案就会发现,无论是义务教育、学生资助,还是基本就业服务、基本养老保险,抑或是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卫生计生、基本生活救助、基本住房保障,八个类别统统与人和家庭紧密相连。

“首先应该明确一点,这次改革不是涉及所有的财政事权,更不是所有的事权,而是限定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共同财政事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改革以与“人”最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为突破口,体现了中央关于兜住基本民生底线的要求。

他认为,这次改革的一大重点,在于为共同财政事权方面划分支出责任,并不是说这是手术刀式的改革方案,支出责任划分原来就有,现在是要更加明确化、规范化。而且,改革方案定了以后,各地就要严格按照此执行,不能再出现推诿扯皮等现象。

另外,改革方案明确,地方在确保国家基础标准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制定高于国家基础标准的地区标准,高出部分所需资金自行负担。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看来,在人民群众最为贴近的领域启动改革,使原先笼统的、不尽统一规范的支出责任变得清晰明朗,这本身就是在更加强调人民的获得感。

不再以东中西为划分依据 财政资源配置更显科学

外界普遍关注的一点是,本次改革方案中,中央对不同地区并没有简单按东中西确定分担比例分担支出责任,而是大体依据地方财力分档确定分担比例。

以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普通高中教育免学杂费补助、计划生育扶助保障等7个事项为例,中央分担比例由此前的七档简化归并为五档。第一档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份,中央分担80%。第二档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10个省,中央分担60%。

第三档包括辽宁、山东、福建3个省,中央分担50%;第四档包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4个省份和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5个计划单列市,中央分担30%;第五档包括北京、上海2个直辖市,中央分担10%。

中央财经大学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所长李俊生教授说,我国幅员辽阔,改革开放40年来,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此次改革没有沿用以往的划分方式,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分档划分的优势显而易见,一是打破利益格局固化、更显公平,二是从实际出发、体现科学。”刘怡说。

由易到难 为深化改革“打前站”

实际上,在推出这份改革方案前,中央已经数次就相关领域改革作出了部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要求。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作了明确部署。两年后,国务院于2016年8月印发《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总体要求、划分原则、主要内容和配套措施等。

本次涉及八大类18项的民生领域改革,正是此前一系列部署的最新落实。

刘尚希认为,这份改革方案的另外一个亮点在于,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设立共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移支付,原则上将改革前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安排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事项,统一纳入共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移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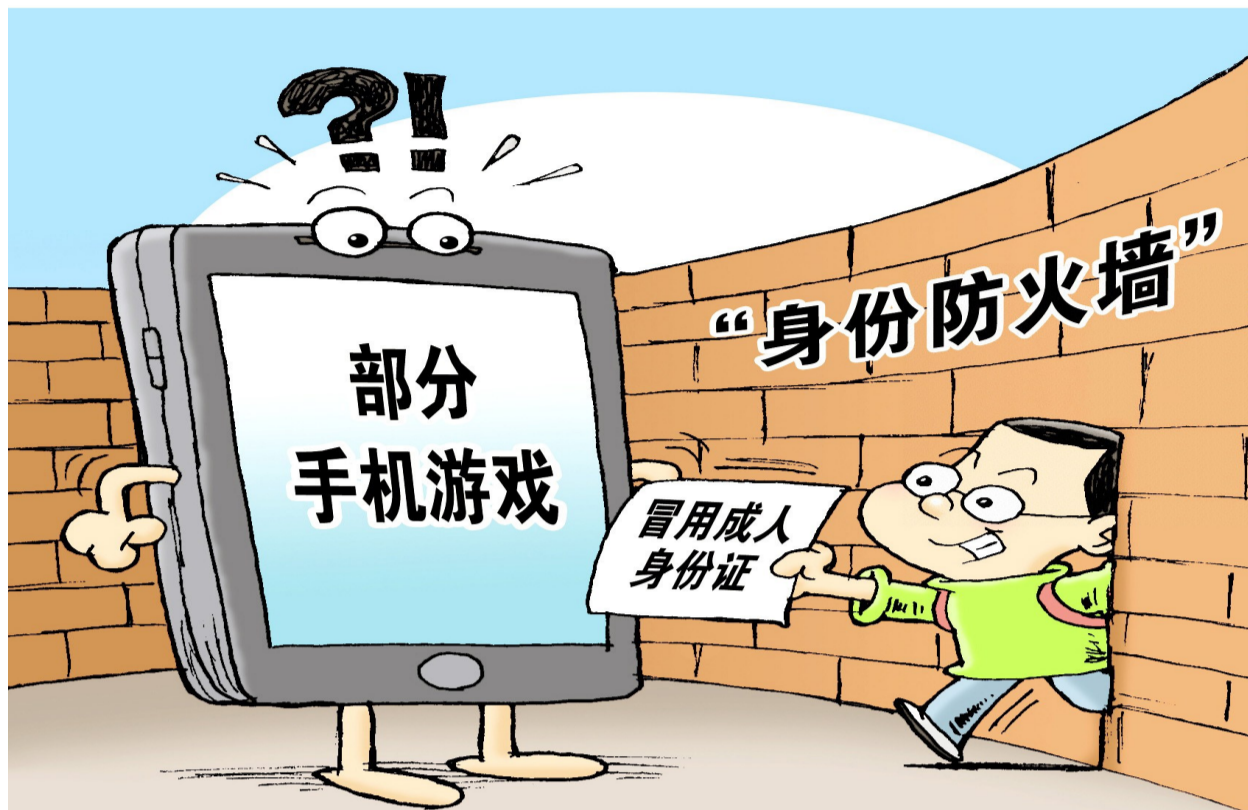
“这类转移支付体现了中央的支出责任,减少了专项转移支付,是对转移支付制度的重大调整完善。”他说,“表面上看,动静似乎不大,但实际作用是相当大的,一旦机制形成,以后支出责任就要按这个走,这是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共同财政事权分类分档转移支付项目都对应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优先予以保障。

李俊生认为,这次改革方案主要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相关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实际上,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中虽有提及推动省以下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但没有详细阐述,这也是从易到难的战略考虑。

“这次改革是个新的起步。”刘尚希说,“饭得一口一口吃,能向前迈一步,就是胜利。”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手机游戏因易致未成年玩家沉溺一再引发争议。某游戏的开发商推出号称“最严防沉溺措施”,却遭遇上线当日即被“破解”的尴尬。而破解方式简单到只需换个成年人的身份证号即可。看来,筑牢“身份防火墙”防沉溺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还给孩子一片网络净土

——规范网络游戏专项行动获社会各界“点赞”



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有效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推动我国网络游戏健康发展,日前,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并迅速开展专项行动,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给违法违规行为以有力震慑。专项行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获得了学生家长、老师和社会各界的一致“点赞”。 ■新华社记者 胡浩 史竞男

促使网游行业转型升级

“部署针对网络游戏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内容的集中整治,揭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网络游戏行业治理大幕。以本次行业治理为契机,网络游戏正在告别野蛮生长的旧阶段,迎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马立新说。

“资深游戏玩家”湖南媒体工作者苏志鹏认为,专项行动对网游市场的整顿治理能产生积极效果。“通过规范,让一些健康的、益智的网络游戏更百花齐放;

游戏不能是黄赌毒,而应该是一种健康的休闲方式、竞技项目。”苏志鹏说。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认为,专项整治行动非常必要,“国家和全社会要像对待教科书那样认真对待网络游戏”,严禁与青少年年龄和心理发展水平不相配的暴力、色情等负面因素。

“网络游戏不仅是娱乐产品,也是创意文化产品,不仅有娱乐的属性,更

应该有文化的内涵。”广东省文化厅市场与产业处处长李再炎说,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抵制清除不良内容,行业才能长足发展。

媒体评论认为,从八部委联合下发意见进行集中整治,到典型案例的公布,再到行业企业开展自查自纠,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告别简单、粗暴的网游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健康、规范、有序的行业环境。

推动网游企业增强责任意识

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的专项行动给游戏公司的经营者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网络游戏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和文化载体,对人的影响非常大。因此,相较于一般的产品或服务提供者,游戏的开发设计者和运营者要肩负的传播文化正能量的责任和义务也应当更大。”

为推动网游企业增强责任意识,广东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召开了全

省网络游戏市场专项规范整治工作座谈会,要求各网络游戏企业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守法律红线,坚持正确导向,落实主体责任。

北京市50余家网络文化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倡议书》,作出积极承担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内容审核力度、坚决抵制泄露游戏用户个人信息等5项承诺。

一些网络游戏企业负责人表示,将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内容自审

制度,明确专门部门,配备专业人员负责审查把关,加强运营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网络游戏产品内容和活动的合法性。

对此,网友纷纷拍手叫好。网友“会飞的鱼”说,企业应切实承担主体责任,不能唯利是图,将法律底线和社会道德抛诸脑后。这次专项行动敲响了警钟,对一些案例的公布更是让网游企业不敢心存侥幸,让全社会更加警醒。

为孩子们撑起绿色“保护伞”

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而言,网络游戏已成为重要的娱乐方式。优秀的网络游戏能激发正能量,引导树立正确人生观,而一些以低俗、暴力、色情等为卖点的游戏则会严重影响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马妍是北京一位年轻的母亲,她深刻体会到网络游戏对孩子的吸引力。“一些四五岁的孩子就开始玩小游戏了,青少年触网年龄越来越小。作为妈妈,担心孩子接受其中不良信息,比如一些宫斗游戏中错误的历史观、价值

观,还有一些带有性暗示的桥段等。”

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杭州市长河高级中学校长何东涛认为专项行动的开展很有必要,也很及时。“学生对校园贷、金融传销较容易辨别其危害性,而对于携带隐性经济行为的网络游戏却缺少警惕,有些成瘾后甚至不可自拔。”何东涛说,八部委发布文件亮明了政府的态度,可以引起社会对网游问题的足够重视。

“规范网游市场,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大有益处,因为网游对未成年人的

影响已经到了必须管控的地步。”湖南湘潭市英语教师刘雅纯说,减少网游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在相关部门规范网游市场的同时,家庭教育同样要跟进,父母应当给予更多陪伴和引导。

北京市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刘铁京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游戏防沉迷机制,自觉传播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使网络游戏不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也要真正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的清朗空间。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今年中国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多稳”局面

新华社南宁2月8日电(记者陈琳 伟 何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8日说,2018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2018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8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李伟在会上说,去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宏观趋稳、微观向好的积极局面,中高速增长平台基本确立,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李伟认为,去年我国经济出现六方面积极信号:一是经济增速稳的态势更加巩固。经济增速已逐步调整至与中高速增长潜力相适应的水平,与就业、物价、效益等指标更趋匹配。二是增长从投资驱动为主开始转向消费驱动为主,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下降,而更加依靠消费驱动。三是企业经营从速度效益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盈利出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的微观活力不断增强。四是风险从不断聚集转

向逐步释放,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放缓,金融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五是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逐步恢复。六是世界经济从复苏乏力转向普遍复苏,为我国增长阶段转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关口期,围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实现高质量的供给、需求、资源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循环。”李伟说,同时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金融风险压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房地产稳定发展局面尚未形成;地方举债需要进一步规范;通胀抬头可能增加政策调整压力;部门间政策协调需要加强。

2018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主题为“聚焦高质量,开启新征程,努力开创政策咨询研究工作新局面”。